

欧洲满文文献典藏述略

——以拉脱维亚、瑞典和丹麦为例

王 敌 非

(黑龙江大学 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拉脱维亚大学历史文献部、瑞典皇家图书馆与丹麦皇家图书馆均藏有部分满文文献,其中不乏珍善本文献。对这批文献的整理研究不仅可以了解拉脱维亚、瑞典和丹麦满文文献的收藏历史情况,而且对于熟悉欧洲汉学史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 键 词: 欧洲; 满文文献; 著录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922(2016)03-0189-05

DOI:10.16415/j.cnki.23-1021/c.2016.03.035

一、拉脱维亚大学科学图书馆(里加)

拉脱维亚远东与中亚语言的研究包括对汉语、满语、蒙古语、藏语和日语等语言的研究,与此相关文献主要藏于拉脱维亚大学科学图书馆历史文献部(The Scientific Library of the Latvian University,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拉脱维亚国家图书馆珍本写本部(The State Library of Latvia, The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拉脱维亚学术图书馆珍本写本部(The Library of Latvian Academy, The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和拉脱维亚美术馆(The Latvian Museum of Fine Arts)。这批文献多为汉学家彼得·施密特(Peter Schmidt, 1869—1938)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收藏。据德国目录学家瓦尔拉文斯(Hartmut Walravens)的研究^[1],1965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Б. Л. Рифтин, 1932—2012)首次向学界介绍了拉脱维亚的中国文献典藏^[2]。1989年,拉脱维亚大学科学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历史学博士史莲娜(Jelena Staburova)与俄罗斯汉学家雅洪托夫(К. С. Яхонтов, 1926—)合作整理出版了彼得·施密特藏书目录。1990年,史莲娜在彼得·施密特的传

记中增列了部分中国文献^[3]。由此可知拉脱维亚中国文献的典藏情况:

1. 拉脱维亚美术馆藏有少量中国图画与出版物。
2. 拉脱维亚学术图书馆藏有档案文件和东方语言书籍。档案文件包括彼得·施密特关于俄语、拉脱维亚语、德语、阿尔泰语、通古斯语、那乃语、满语及汉语方面的论文,彼得·施密特个人信件;东方语言书籍包括蒙古文古籍四种、藏文古籍一种,及《游历满蒙地理本草第四部》《古迹考证·壹》《张家口挖坟贴》《番族事》和《皇太后六旬万寿恭赋》等汉文写本古籍五种。
3. 拉脱维亚国家图书馆藏有满汉合璧写本《雍正十年五月十六日壬申望月食图》、汉文古籍《图像本草蒙荃》《长远两友相论》《新约全书》等汉文写本古籍三种和日本画卷四种。
4. 拉脱维亚大学科学图书馆东方文献典藏主要分为三类,第一,汉文、满文及日文的刻本、写本和影印本;第二,以西方语言或俄语编写的东方语言研究著述;第三,苏联时期出版的古西伯利亚诸语言研究著述。

由此可见,拉脱维亚的满文文献主要藏于拉脱维亚大学科学图书馆。1979年,德国汉学家稽穆(Martin Gimm, 1930—)为拉脱维亚大学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制作了著录卡片。1992年,雅洪托夫

收稿日期:2016-02-1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CMZ010)成果

作者简介:王敌非(1982—),男(满族),内蒙古包头人,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满文文献整理研究。

将拉脱维亚大学图书馆彼得·施密特藏书目录中的满文文献单独出版,题为《里加收藏的满文写本与刻本》^[4],由此可以看出拉脱维亚藏满文文献主要有:

(一) 历史类

《读史论略》二卷,道光十年(1830)京都三槐堂刻本,满汉合璧。

(二) 教学类

《满蒙合璧三字经注解》二卷,抄本,满蒙合璧。

(三) 工具书类

《清文汇书》十二卷,乾隆十五年(1750)四合堂刻本,满汉合璧;《清文补汇》八卷,嘉庆七年(1802)刻本,满汉合璧;《大清全书》十四卷,康熙二十二年(1683)京都宛羽斋刻本,满汉合璧;《清书指南》三卷,康熙五十一年(1713)刻本,满汉合璧;《清文总汇》十二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荆州驻防翻译总学刻本,满汉合璧;《蒙文总汇》不分卷,光绪十七年(1891)武英殿刻本,满蒙汉合璧;《音汉清文鉴》二十卷,雍正十三年(1735)宏文阁刻本,满汉合璧;《满汉同文分类全书》三十二卷,又作《满汉类书》,康熙四十五年(1706)刻本,满汉合璧;《同文汇集》四卷,康熙三十九年(1700)寄畅斋刻本,满汉合璧;《初学必读》不分卷,光绪十六年(1890年)聚珍堂刻本,满汉合璧;《清汉文海》四十卷,道光元年(1821年)江南驻防衙门刻本,满汉合璧;《清文典》四卷,乾隆元年(1736年)刻本,满汉合璧;《满汉六部成语》六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文英堂刻本,满汉合璧;《清语摘钞·四种》不分卷,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满汉合璧;《满汉成语对待》四卷,云林堂刻本,满汉合璧,其间存俄英德拉丁文注释;《实录内摘出旧清语》十四卷,乾隆年间刻本,满文;《清文启蒙》四卷,凡两部,雍正八年(1750)刻本,满汉合璧;《初学指南》二卷,乾隆五十九年(1794)邵衣堂刻本,满汉合璧;《清文指要》三卷,嘉庆十四年(1809)二酉堂刻本,满汉合璧;《续编兼汉清文指要》二卷,嘉庆十四年(1809)二酉堂刻本,满汉合璧;《清文虚字指南编》二卷,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满汉合璧;《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二卷,光绪二十年(1894年)聚珍堂刻本,满汉合璧;《清文虚字歌·清文接字·清文接字歌》一

卷,写本,满汉合璧;《清文虚字歌》一卷,抄本,满汉合璧;《清文虚字类》一卷,道光二十九年(1849)写本,满汉合璧;《蒙文晰义》不分卷,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满蒙汉合璧;《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光绪三十四年(1848)奉天蒙文学堂影印本,满蒙汉合璧;《古文渊鉴》六十四卷,康熙二十四年(1685)内府刻本,满文;《翻译古文》十六卷,咸丰元年(1851)槐荫山房刻本,满汉合璧;《摘翻聊斋志异》二十四卷,凡两部,道光二十八年刻本,满汉合璧;《满汉合璧西厢记》四卷,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合璧。

二、瑞典皇家图书馆(斯德哥尔摩)

瑞典皇家图书馆(Kungliga Biblioteket)建立于1611年,是瑞典最大的人文科学研究图书馆。瑞典皇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的来源,学界不得而知。19世纪70年代,现代文学家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在整理馆藏中国文献时,发现部分满文文献。这批文献由奥地利汉学家查赫(Erwin Ritter von Zach,1872—1942)于20世纪初赠予皇家图书馆^[5]。1972年,文学家约翰(John Rohnström)撰文《皇家图书馆藏满文书籍》公布了九种满文文献,其中珍本二种^[6]。1975年,瑞典皇家图书馆从伦敦凯根保罗出版社(Routledge & Kegan Paul Publisher)购买了原属于英国汉学家翟林耐(Lionel Giles,1875—1958)的满文文献。1985年,约翰复撰文《皇家图书馆藏满文增补书籍》公布于世^[7]。原书目录不分类,详情如下:

《康熙五十九年五月十七日谕旨》,抄本,满汉拉丁文;《天主实义》四卷,乾隆二十三年(1758)刻本,满文;《万物真原》一卷,乾隆二十三年(1758)刻本,满文;《金瓶梅》一百回,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满汉合璧;《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十六卷,道光四年(1824)刻本,满汉合璧;《地藏菩萨本愿经》二卷,刻本,满汉合璧;《御制避暑山庄诗》二卷,康熙五十年(1711)刻本,满文;《御制劝善要言》一卷,顺治十二年(1655)刻本,满汉合璧;《大学衍义》四十三卷,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满文;《四书集注》十七卷,道光八年(1838)刻本,满汉合璧;《小学合解》六卷,雍正五年(1727)武英殿刻本,满文;《孝经合解》不分卷,

又作《孝经集注》，雍正五年(1727)内府刻本，满文《满汉合璧性理》四卷，雍正十年(1732)墨华堂刻本，满汉合璧《满汉经文成语》四卷，乾隆二年英华堂刻本，满汉合璧《御制翻译易经》四卷，乾隆三十年(1765)武英殿刻本，满汉合璧《满洲实录》八卷，民国19年(1930)辽宁通志馆据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内府精写本影印，满蒙汉合璧《小儿语》不分卷，道光二十五年(1845)刻本，满汉合璧《醒世要言》四卷，同治六年(1867)刻本，满汉合璧《读史论略》二卷，凡两部，道光二十九年(1849)京都三槐堂刻本，满汉合璧《清文虚字指南编·清文虚字指南编》，抄本，满汉合璧《光绪二十二年壬子望月食图》，刻本，满汉文。

三、丹麦皇家图书馆(哥本哈根)

丹麦的满文文献主要藏于丹麦皇家图书馆(Det Kongelige Bibliotek)。1648年，丹麦及挪威国王弗雷德里克三世(Frederik III, 1609—1670)谕令筹建皇家图书馆，并设有专门保管满文文献的东方文献部。丹麦皇家图书馆虽藏有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数量最多的满文文献，但在数量上远不及欧洲其他国家藏品和馆藏蒙古文文献。这批满文文献多由汉学家伍尔夫(Kurt Wulff, 1881—1939)于1922年在北京获得，另有部分自1938年—1939年丹麦皇家地理学会第二支中亚探险队成员汉学家廖恩贝赫(Karre Gronbech, 1901—1957)处获得。1971年，德国著名蒙古学家海西西教授(Walther Helligs, 1913—2005)编撰了《丹麦皇家图书馆藏蒙古文书籍目录》^[8]，其中与满文相关的文献17种。1989年，因与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合并，丹麦皇家图书馆入藏了原属哥本哈根大学东亚学院(Ostasienabteilung der Kopenhagen Universität)的《四书集注》《古文渊鉴》和《西厢记》等三种满文文献。随后，丹麦皇家图书馆入藏了原属民族博物馆(Enthnographische Museum)的五种满文档案和二种满文古籍。1991年，德国满蒙学家福华德(Walter Fuchs, 1902—1979)与马丁·吉姆合作编撰的《丹麦皇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目录》^[9]，著录满文文献105种。这份目录与《丹麦皇家图书馆藏蒙古文书籍目录》不重复著录，由此可以看出丹麦皇家图书馆

藏满文文献主要有：

(一) 辞典类

《御制清文鉴》二十卷，凡两部，康熙四十七年(1708)武英殿刻本，满文《御制清文鉴序》不分卷，刻本，满文，其间存满文的蒙古文音读《御制满蒙文鉴》二十九卷，据康熙五十六年(1717)刻本重抄，满蒙合璧《清文备考》二卷，康熙六十一年(1722)刻本，满汉合璧《音汉清文鉴》二十卷，凡两部，雍正十三年(1735)文瑞堂刻本，满汉合璧《清文汇书》十二卷，乾隆十六年(1751)英华堂刻本，满汉合璧，另存三槐堂刻本一部《御制增订清文鉴》四十六卷，存乾隆三十六年(1771)武英殿刻本四部，抄本一部，满汉合璧；《三合便览》不分卷，乾隆四十五年(1780)邵衣堂刻本，满蒙汉合璧《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十一卷，乾隆四十五年(1780)刻本，满蒙汉合璧《清文补汇》八卷，乾隆五十一年(1786)刻本，满汉合璧《清文鉴》，道光二十七年(1847)抄本，满文《蒙文总汇》不分卷，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满蒙汉合璧，另存民国2年(1913)北京正蒙印书局石印本一部《满蒙合璧文鉴》，写本，满蒙合璧。

(二) 工具书类

《满汉经文成语》四卷，乾隆二年(1737)文瑞堂刻本，满汉合璧《满汉经文成语》三卷，抄本，满汉合璧《清文典要》四卷，乾隆三年(1738)文锦西堂刻本，满汉合璧《清语摘抄》不分卷，光绪十五年(1889)三槐堂刻本，满汉合璧《初学必读》不分卷，光绪十六年(1890)聚珍堂刻本，满汉合璧《满汉合璧类抄》，抄本，满汉合璧。

(三) 语法、会话和信件类

《满汉字清文启蒙》四卷，雍正八年(1730)刻本，满汉合璧《嘉庆辛酉年新出对像蒙古杂字》不分卷，嘉庆六年(1801)刻本，满蒙合璧《钦定清汉对音字式》不分卷，据乾隆三十七年(1772)三槐堂刻本重印，满汉合璧《一百话条》，道光二十三年(1842)写本，满汉合璧《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二卷，光绪二十年(1894)聚珍堂刻本，满汉合璧《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十卷，宣统元年(1909)刻本，满蒙汉合璧《抄满文虚字法》，抄本，满文《一百条》四卷，刻本，满汉合璧《书信汇集》，写本，满文写本，满蒙合璧。

(四) 经典类

《御制翻译四书》六卷,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满汉合璧《论语·卷下》,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满文《大学》,抄本,满蒙汉合璧;《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康熙十六年(1677)内府刻本,满汉合璧《孟子·卷上》二卷,凡三部,据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重刻,满汉合璧《孝经》一卷,康熙四十七年(1709)刻本,满汉合璧。

(四) 哲学教育类

《御制人臣敬心录》一卷,顺治十二年(1655)刻本,满文《醒世要言》四卷,康熙四十三年(1704)刻本,满文《黄石公素书》一卷,康熙四十三年(1704)刻本,满汉合璧《性理一则》不分卷,康熙四十五年(1706)刻本,满汉合璧《菜根谭》二卷,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满汉合璧《御制性理精义》十二卷,康熙五十六年(1717)刻本,满文《圣谕广训》四卷,雍正二年(1724)刻本,满蒙汉合璧《圣谕广训》不分卷,雍正二年(1724)三槐堂刻本一部,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两部,写本一部,满汉合璧《圣谕广训》不分卷,凡2部,雍正二年(1724)刻本,满蒙合璧《满汉合璧性理》四卷,雍正十年(1732)墨华堂刻本,满汉合璧《七训》二卷,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满蒙合璧《传家孝》不分卷,甘肃直隶泰州博赫翻译刻本,满汉合璧《父母惟其病之忧》不分卷,刻本,满汉合璧《谕哲里木盟十旗兴学劝业文》不分卷,宣统元年(1909)刻本,满蒙汉合璧《古时五家为邻》,写本,满蒙合璧。

(五) 历史管理类

《纲鉴会纂》四卷,康熙三年(1664)刻本,满文《资治通鉴纲目》一百一十一卷,存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一部,满文,另抄本一部《潘氏总论》,刻本,满汉合璧《上谕》,雍正二年(1724)刻本,满文《儒林传》一卷,实为《八旗通志·初集》节选,抄本,满文《钦定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传》十一卷,道光十六年(1836)武英殿刻本,满汉合璧《钦定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九卷,道光十六年(1836)武英殿刻本,满汉合璧《满洲正红旗头甲喇参领副参领》,道光二十九年(1849)写本,满文《办理钱粮米谷第十四篇》,写本,满蒙合璧《理藩院则例》五十卷,道光二十九年(1849)武英殿刻本,满文《则例》,抄本,满文,含

《大清律例》《户部则例》《兵部审讯则例》《理藩院则例》。

(六) 文学类

《满蒙汉合璧三字经注解》二卷,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满蒙汉合璧《满蒙汉合璧三字经注解》二卷,刻本,满汉合璧《满蒙合璧三字经》,凡三部,抄本,满蒙合璧《翻译古文》十六卷,咸丰元年(1851)刻本,满汉合璧《水浒传》,抄本,满文《古文渊鉴》六十四卷,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满文《隋唐演义》,抄本,满文《合璧西厢记》四卷,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合璧;《满蒙汉合璧思孝歌》不分卷,刻本,满蒙汉合璧。

(七) 其他类

《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不分卷,康熙四十三年(1704)刻本,满汉合璧《骼体全录》,抄本,满文《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六卷,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本,满文《光绪十二年日历》不分卷,刻本,满文《道光二十三年日历》不分卷,刻本,满文《大清同治十一年时宪书》不分卷,刻本,满文《吾主耶稣基督新遗诏书》不分卷,道光十五年(1835)圣彼得堡刻本,满文《马太福音书》,刻本,满汉合璧《贤劫千佛号》二卷,刻本,满蒙汉藏梵合璧《圣观世音品轮经》,刻本,满文《章嘉呼图克图等号灌顶普善广慈》,刻本,满蒙藏汉梵合璧《梁国传世二十世三百年》,写本,满蒙合璧。

除此之外,丹麦皇家图书馆还藏有传教士或汉学家编撰的著述文献17种。这批著述文献主要为满语学习的工具书及满文档案的摘抄,以写本居多且缺少题名。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拉脱维亚、瑞典和丹麦收藏的满文文献多为刻本,且在国内均有收藏,其收藏的写本文献主要集中于丹麦,虽然国内未藏,但多为国内现存文献的节选或合辑,如《儒林传》节选自《八旗通志·初集》,《满洲正红旗头甲喇参领副参领》为由正红旗相关满文档案组成的合辑等。

第二,从数量上看,丹麦收藏的满文文献最多,总计100种,瑞典收藏的满文文献最少,总计21种;从收藏范围看,各单位收藏的满文文献均涉及语言、历史、宗教和文学诸多方面,其中以语言类文献最为突出;从分布范围看,拉脱维亚收藏

的满文文献分布最为广泛,除主要收藏于拉脱维亚大学外还藏于国家图书馆,丹麦与瑞典的满文文献分布较为集中,主要藏于本国的皇家图书馆。

第三,拉脱维亚、瑞典和丹麦收藏的满文文献在文种上多为满文、满汉合璧和满蒙合璧,其他文种文献相对较少,仅丹麦皇家图书馆藏满蒙汉藏梵合璧《贤劫千佛号》,其他另外部分文献行字间存外文注释,如拉脱维亚大学藏《满汉成语对待》存俄英德拉丁文注释等。

拉脱维亚、瑞典和丹麦收藏的满文文献在数量上不如欧洲其他国家藏品,但仍有部分珍本和传教士汉学家著述不为学界所知。整理与研究不仅可以了解拉脱维亚、瑞典和丹麦满文文献的收藏历史情况,而且对于熟悉这些国家汉学史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Hartmut Walravens, Peter Schmidt Ostasienwissenschaftler Linguist und Folklorist Eine vorläufige Biobibliographie, *Florilegia manjurica*, Wiesbaden, 1982: 106 – 185.
- [2] Hartmut Walravens, The Collection of P. Schmidt's works, *Gesammelte Arbeiten zur Tungusologie und Mandjuristik*, Hamburg, Bd1, 1983.

- [3] Б. Л. Рифтин, В Поисках ред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и ксилографов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Москва, 1965: 243 – 247.
- [4] Je. Staburova, Vins devās celā īstajā laikā un pareizajā virzienā. austrumu pētnieks gramata, Riga, 1990: 6 – 12.
- [5] K. S. Yakhontov, Manchu Blockprints and Manuscripts in Riga The Peter Schmidt's Collection, 1992.
- [6] Alfred Hoffmann, Dr. Erwin Ritter von Zach in memoriam, *Verzeichnis seiner Veröffentlichungen. Oriens extremus*, 1963: 1 – 60.
- [7] John Rohnström, Manchu Printed Books in the Royal Library in Stockholm,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1972: 133 – 140.
- [8] John Rohnström, Manchu Printed Books in the Royal Library in Stockholm Continued,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1985: 113 – 117.
- [9] Walther Helligs, Catalogue of Mogol Books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Copenhagen, 1972.
- [10] Walter Fuchs, Martin Gimm, Katalog der Mandjurica in der Königlichen Bibliothek Kopenhagen, *Aetas Manjurica*, 1991: 42 – 116.

[责任编辑 谷文双]

Brief of Manchu Books from Europe

——Taking Latvia, Sweden, and Denmark as an example

WANG Difei

(Manchu Language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few Manchu books in Scientific Library of the Latvian University, among which some rare books are found. The sorting and research of these literatures can not only help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Manchu documents collection in Latvia, Sweden, and Denmark, but also provide a reference to the acquaintance of European Chines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course.

Key words: Europe; Manchu documents; Bibliographic